

妇女运动史资料

3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福建妇运史资料

第三集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目 录

女共产党员张溪兜·····	邱炳皓 陈仙海 林奇英	(1)
不朽的女战士·····	温仰春	(7)
回忆张锦辉·····	张福高口述 黄温基整理	(22)
回忆吴富莲同志·····	刘 晓	(32)
记陆碧如烈士·····	王炼予	(37)
九家保·····		(40)
陈客嫫·····	苗蓝田	(46)
岐岭女英烈		
——记坚贞不屈的陈康容烈士·····	卢富超	(56)
不屈的女战士——罗荣德·····	陈茂辉	(60)
女交通员——施月姿·····	陈松青	(66)
坚贞不屈的女英雄——金维娇·····	游锦康	(70)
简秋蓉英勇不屈·····		(74)
蔡翔云烈士·····		(76)
魏雪馨烈士传略·····		(77)
柯海燕烈士传略·····		(80)
英雄母子·····	杨 穆	(82)
刘惜芬烈士事迹片断·····	啸 马	(92)
晋江地区女革命烈士名单·····		(101)

女共产党员张溪兜

邱炳皓 陈仙海 林奇英

张溪兜同志原名张秋玉，福建省龙岩县东肖溪兜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因为家境贫寒，溪兜刚生下三十五天，家里被迫把她送给东肖后田村张三姑家当“等郎妹”。

张三姑也是个穷苦人。溪兜从小就泡在苦水里。有一年除夕前夕，三姑投亲告友，好不容易借到两块光洋，叫溪兜到地主陈水旺家籾米，让家里吃个“团圆饭”。陈水旺却把头一歪，鄙夷地把鼻子一哼：“哧！两块钱不够我开仓费，不卖！”说完恶狠狠地把溪兜赶出大门。溪兜只好空着双手，愤愤地回到家里。苦难的童年，黑暗的世道，在溪兜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仇恨种子，锤炼了她那反抗的性格。

一九二六年冬，共产党员郭滴人，从毛泽东同志亲自主办的广州农讲所毕业后回到龙岩，来到后田村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秋，邓子恢同志也来到后田。他们都以“衍新小学”教师为公开职业，利用办夜校的机会，向农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后田村的陈锦辉等青年农民，觉得郭、邓二位老师讲的道理，都是穷人要说的心理话。于是，他们利用平时劳动的机会，把这些革命道理向村里的穷苦人作宣传。聪明伶俐的张溪兜听得津津有味。有一天，收工回家路上，她缠着陈锦辉认真地问了个究竟。当她听说夜校郭、邓二位老师给穷人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时，心里高兴极了。说什么也要陈锦辉帮忙在老师面前说个情，让她也去上夜校。

溪兜回到家，心头一直惦念着这件事。吃过晚饭，她借口对婆婆说要到邻居二姑姐家去玩。一出大门，她却径直来到衍新小学。开始，她犹豫着不敢推门进去，便摸索到窗口，向里面窥探，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围坐在郭滴人、邓子恢两位老师的身旁，热烈地讨论着什么问题。她想了想，鼓起勇气，推门进去。邓子恢同志看见张溪兜来了，就热情地招呼她坐下，并说：“你的要求，刚才锦辉已经对我们说了，我们欢迎你上夜校。”

张溪兜感动得热泪盈眶，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幸福。张溪兜成了青年夜校的第一名女学员。从此，她象旱苗得甘霖，开始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她抱定要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愿望，参加了秘密农会，成了第一个女农会会员。

后来，婆婆也在张溪兜的影响下一起参加了革命。

一九二七年秋冬，郭滴人、邓子恢、罗怀盛等同志领导着秘密农会开展了“二五减租”、抗捐、抗粮斗争。溪兜同志很善于做宣传工作，她挨家挨户，耐心地对农友们说：“穷人减租是正理的事。不要怕，豪绅地主人少，我们人多，只要我们真诚团结起来，坚决同他们作斗争，二五减租一定会实现。”

减租抗捐运动很快地发动起来了，穷人们纷纷起来跟地主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地主看到农会人多势众，害怕了，只好勉强答应了减租的条件。减租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农友们的战斗热情。

钢铁在烈火中炼成，溪兜同志也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一九二八年春，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龙岩县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在龙岩县委郭滴人、邓子恢、罗怀盛等同志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后田暴动”。枪声划破了夜

空，震撼着闽西。张溪兜和党支部书记陈锦辉等同志一马当先冲向豪绅地主的巢穴，收缴田契借约，当场焚毁；并宣布从此旧债不还，田租不交，田地由农民分配。人们通宵达旦地沉浸在暴动胜利的欢乐之中。

第二天清早，张溪兜同志手持一把锋利的斧头，领着农友们直奔火星祠堂，朝地主把持的公田谷仓大门“咔嚓”一声，砸开了铁锁，把一筐筐金灿灿的谷子发给穷苦农民。

后田暴动的胜利吓破了四乡豪绅地主的狗胆，他们纷纷逃进了龙岩城，向反动军阀陈国辉求援。一星期后，陈匪派出了一个团的兵力进犯后田。县委及时地把农民武装撤至后山打游击。组织上安排溪兜同志留在村里侦察敌情，负责游击队的粮食、弹药等给养。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于后田、榴坑、联邦等一带乡村，及时地向游击队递送情报，让游击队痛歼敌人。

后来，敌人四处张贴赏格要捉拿张溪兜同志。一天傍晚，溪兜在给游击队送情报、盐巴和草鞋的路上，不幸被捕。在敌人的审讯室里，她受到严刑拷打。

“你就是张溪兜吗？”一个敌军官怒吼道。

“既然晓得了，还问什么？！”溪兜嘲讽地回答说。

“游击队在哪里？”

“他们今晚在这里，明天在那边，谁知道在什么地方！”那家伙气得一张面孔如同过夜的猪肝，咆哮地喊叫起来：

“给我捆起来，打！”

皮鞭象雨点一样落在张溪兜的身上、脸上，殷红的鲜血顺着嘴角流淌下来，但溪兜同志巍然挺立。敌人改用烟火烧她。她几次昏了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但是敌人仍然一无所得。敌人束手无策，只好判她三年徒刑，送进监狱。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攻下了龙岩城。红军从敌人铁牢中把张溪兜同志拯救出来。张溪兜热泪盈眶，回到了革命队伍，继续战斗。

一九三一年春，由于反革命分子林一株窃取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职务，大搞“肃反”扩大化，溪兜的丈夫陈家泉同志被杀害了，她自己也被停止了党组织生活。这个事件虽给她带来莫大的痛苦，但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溪兜同志并没有灰心和消沉，仍然相信党，相信群众，继续努力做革命宣传工作。这年夏天，毛泽东同志派郭滴人同志回到闽西及时地纠正了这一错误。溪兜同志激动不已，便积极向组织提出要求分配她的工作。组织上答应了她的要求。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敌人在闽西地区布置了整整八个主力师的兵力，纠集了各种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对坚持敌后斗争的游击队进行了“清剿”。他们还采用了一套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砍树，烧光、抢光、杀光等血腥政策，对闽西人民实行灭绝人性的摧残。

在这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期，张溪兜同志更是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地战斗着。这时，她担任了后田乡党支部书记，兼东肖区委委员，负责游击队的后勤工作，积极协助红八团在后田村后山搭起了竹寮，建立了临时被服厂。她串联后田、榴坑、联邦等村的妇女，克服了重重困难，筹集了大批布料，带领妇女们用唯一的一架缝纫机，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为红军赶制了二百多套衣服。那时候她不论编草鞋、买油、买盐、搞粮食、侦察敌情，她都身先士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游击队的同志都称赞她，钦佩她，亲切地叫她溪兜姐。

一九三六年夏天，敌人派了一个团的重兵进驻东肖。敌人一进村，就到处通缉张溪兜。可是敌人枉费心机，找不到任何

线索。张溪兜同志和群众心连心，她生活战斗在人民中间。这年冬天，敌人又增调了广东军进驻闽西“清剿”，形势更加紧张了。区委决定避开敌人，由后田迁到榴坑。区委的文件、武器，一时来不及全部带走，仍秘密藏在溪兜家的夹墙里。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区委获悉溪兜的婆婆张三姑被捕的消息。溪兜同志想到家里夹墙中密藏的文件和武器，立即和区委书记连夜赶到后田。次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当他们刚把这批文件、武器转移到了榴坑，和同志们正在一个接头户的阁楼上开会时，不料被民团暗探发现了。敌人很快就包围了榴坑。溪兜同志一看情况危急，便果断镇静地叫区委书记和另一个人把文件带好先撤。

“溪兜同志，快一齐撤吧！”区委书记说。

“不！快撤，我掩护！”溪兜同志斩钉截铁地说。

“溪兜同志！……”

“快撤！为了党的利益，不要管我！”

区委书记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和另一个人跳出窗户，朝后山撤退。溪兜同志马上举枪射击，故意把敌人火力引向自己。“叭！叭！”领头的二个匪兵应声倒下。敌人吓得连连后退，乱作一团，爬在大树后面朝阁楼开枪。匪军官狂叫道：

“抓活的，谁抓到溪兜，赏光洋一百！”溪兜同志鄙夷地笑了笑：“哼，白日做梦！”她举枪“砰”的一声，打飞了狗官的帽子，吓得他神飞魄散，紧紧地趴在地下。过一会儿，密集的子弹又向溪兜飞来，打得土墙尘灰掉落。敌人逐渐逼近阁楼，溪兜又举枪扣动扳机，不料子弹打光了。她立即把手枪藏到墙洞里，挥起板凳向窗外砸去。突然，她身体一震，不幸中弹倒下。一会儿，她缓缓地站立起来，走了几步，扶着门框，遥望着区委书记他们撤退的方向，嘴角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敌人冲上了阁楼，一见溪兜同志巍然屹立在楼梯口，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吓得连连后退。敌人又朝她开了一枪，溪兜同志身体微微一震，使尽全身力气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张溪兜同志壮烈牺牲了，时年三十二岁。她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用自己的鲜血，在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不朽的战士》

不朽的女战士

温仰春

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民主革命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涌现出无数革命英雄。当年活跃在永定、龙岩以及广东、江西边界的范乐春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人民的好干部

一九三〇年冬天，我从中共闽西特委调到永定县去工作，当时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就是范乐春同志。范乐春这个名字，我在闽西特委工作期间，就已经很熟悉的了，但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在我的想象中，这位县苏主席是个知识分子，是个非凡人物。因为在我的一些旧观念里的领导干部总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妇女。到了永定县，范乐春同志来了，这个女主席和我想象中的竟是两个样儿！我不禁从头到脚的打量起她来，只见她身穿粗蓝布小褂，足踏布草鞋，完全是个农妇模样。这怎么象个县主席呀！

过了几天，我就发现，这位女主席象磁石般吸引着许多劳动人民。每天，她的会客室里，总是川流不息的有人前来探望。会客室很简单，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一个大茶壶，人多了，有时只好蹲在台阶上等着。我是秘书长，就帮着做记录。

来访问的劳动人民，都是带着问题前来的。有些人是来向主席诉苦，要求分配土地；有些人请求主席解决来年春耕的种子和畜力问题；有些人来控告反动分子把红军的妻子卖掉了。

一般的青年男女主要是谈婚姻问题，也有谈丈夫、婆婆的虐待问题……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乐春同志处理问题也很干脆，比较简单的问题，她几句话也就解决了；有些问题需要研究的，她就让我一一记下来。我一面工作，一面注意她的举动。只见她和群众接触，显得非常自然；谈话象是谈家常，很亲切，很细致，也很有原则。群众有的叫她主席，也有叫大姐的，年纪大的人，就叫她的名字。她在群众中，好象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是最受爱戴的姐妹。这时我心想：这个女主席果然名不虚传呀！

和乐春同志相处，使人感到很自然。她没有什么架子，对人很真诚，能尊重别人意见，也能教育他人，遇事总和人商量。对问题，懂就说懂，不懂绝不装懂。人也很随和，从没有见她发过脾气，是个很有修养的领导干部。我是广东人，在广东工作期间，地熟人也熟，工作比较好办。一来到这里，困难就多了，她就把当地的情况向我介绍。比如某些来访的群众，是真心实意的请求帮助的；某些人是虚假的到这里来试探和捧场的。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使我有比较，得益不少。

我们的客人中，还有些是来探“亲戚”的。我记得：有一位熊大妈，她从三十里外的湖雷村步行而来，探望她的亲人——乐春同志。原来在革命尚未公开之前，乐春同志住在她的家里搞革命活动，相处得很好，认起“亲戚”来了。现在听说乐春同志当上了县主席，熊大妈禁不住心头的喜悦，徒步前来探望亲人。大妈坐在会客室里等着。不久，乐春同志来了，大妈满脸笑容迎了上去：“主席，你好。”“怎么叫起主席来呀，大妈真是见外了。”乐春同志嗔怪着她。这对亲人一见，谈得分外亲热。大妈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乐春同志的打扮说：

“你怎么当上主席还穿补丁的衣服和草鞋呀！”乐春同志笑了

一笑，还来不及回答，旁边一位同志就抢着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范主席同大妈只有分工不同，为什么要特别享受呢！”熊大妈感动地站起来说：“自从盘古开天地，那有女人当县老爷的？共产党的干部真好！”

我和乐春同志相处久了，我问她：“你一个劳动妇女，参加革命真坚决呀。”她苦笑了一下，捋起衣袖，卷起裤腿给我看，只见手臂上，大腿上伤痕斑斑，目不忍睹。接着，她和我谈起她的身世。

乐春同志出生在永定县溪南区古木乡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十二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留下她和一个年幼的弟弟，无法生活，姐弟俩就在地主家里放牛，喂猪。虽然是谨慎小心地干活，还经常挨打受骂。她十六岁结婚，只好把弟弟寄养在叔叔家里。婆家生活也很苦，田里收的粮食不够养家，她就常常上山砍柴，然后挑到三十里外的县城去卖。

她婚后一年出天花，愈后左眼失明，她挑柴到城里卖，又被那些兵痞、流氓强夺强买；不仅如此，还向她脸上吐口水，拳打脚踢的欺负她。县城里卖柴的妇女很多，别人家都能早早的卖掉了柴回家去，她的柴不是被抢了去就是直到下午还没有人过问。这样，她不得不降低价钱出售。在那年月，她的不幸命运有谁来同情呢？

自从闽西共产党成立，乐春同志就找到自己的亲人了。一九二八年七月她参加金砂暴动，一九二九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就调到永定县任苏维埃主席。乐春同志一接触到革命，就感到党的温暖。她把全身心献给了党，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党的利益就是她的利益。她常说：“与其跪着活，不如拼着死。”

为革命学习文化

我认识乐春同志时，她已二十八岁，但还是个半文盲，只认识二三百字。据她说，她只上过几个月民校。上级的指示她看不懂，向下面发布告，下指示，她不能执笔起草。因此，她迫切地需要学习。当时环境比较苦，没有识字课本，生活也很不安定，但这没有难倒乐春同志。她利用一切空隙时间来学习。行军休息时，她在膝盖上摊开纸张写字，有时拿着树枝在地上划。没有教材，她把标语传单抄下来，把革命歌词抄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念熟了又把字搬家，搬它好几次，直到认识了为止。她有空就学，逢人便问。她白天工作，晚上往往学习到深夜，遇到了难字难句，她就抄在小本子上。她和我研究工作，工作完了，她就掏出小本子来说：“老温呀，这几个字请你解释一下。”我一看，这里有单字，也有闹不懂的问题。不仅对我，对其他同志她也是这样虚心好问的。有些女同志问她：“你学习怎么进步得这样快呀！”她笑了笑说：“铁杵磨花针，只要有恒心。”她就是这样数年如一日地坚持勤奋学习的。

一九三二年乐春同志调到汀州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工作更加繁重，但她还要挤出时间来学习。这时刚好我也调到省政府工作，由我负责给省政府一部分工农干部上课。我考虑到怎样使这些工农同志，在学文化上能够花的时间短而收效快呢？就决定教他们学习实用文——怎样写报告。乐春同志经过几年勤学苦练，文化程度提高得很快，这时她不仅能看懂上级的指示，学会写报告，而且也写过报道文章。她象个瞎子睁开了眼睛，感到多么愉快呀！

乐春同志任永定县苏主席时，县委书记肖向荣同志曾送她

一支钢笔，并勉励她说：“一个革命干部必须学会两套本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我记得，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这支钢笔一直没有离开过乐春同志；她把这支笔作为武器，写下不少布告和指示，也写下许多革命山歌，用来打击敌人。

敢 顶 错 误 路 线

一九二九年春天，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挺进赣南闽西，一举歼灭顽敌郭凤鸣，解放了汀州城。这一胜利震撼了整个闽西地区。毛主席乘胜回师赣南，挺进粤东。五月，再次入闽，直捣龙岩、上杭，使闽西和江西连成一片，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中共闽西特委根据毛主席指示，正确地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并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纲领，交闽西苏维埃政府讨论执行。这个土地革命纲领的基本政策是：坚决地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没收和分配土地；依靠贫农雇农，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土地政策的公布，象一声春雷，多么振奋人心呀！中国贫苦农民渴望了多年的土地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了，就是一般的地主富农，生活上也有出路。贫苦农民得到土地之后，生产热情高涨了，也掀起了参军热潮，使革命战争成为群众性的战争。就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参加红军或做其他革命工作。这样一来，真正反对苏维埃政府跟着国民党进棺材的人，就为数极少了。尽管当时的斗争很艰苦，但群众对革命的信心很足，到处是生动活泼的场面。当时的闽

西，真是一片大好形势。

但是，自从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左”倾路线占据中央领导地位，尤其一九三三年春，临时党中央自上海迁入江西根据地之后，就进一步全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仅要消灭地主阶级，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分子。但是，他们对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分不清楚，有时就把富裕中农，甚至一般中农作为富农来打击，严重地侵犯中农利益，使党在农村中只有依靠的力量，没有团结的对象，贫雇农在农村中感到孤立，使得党的土地政策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当乐春同志由永定县调到省苏维埃政府担任土地部长时，正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全面贯彻的时候。作为土地部长，她要按照中央指示办事，执行当时的错误政策，但她在执行过程中，遭到群众的反对，土地政策贯彻不下去。这种矛盾，使她十分不安。她是群众中间生长起来的干部，群众关系好，群众有意见愿意向她反映。贫苦农民及基层干部很坦率地告诉她：

“我们不怕敌人烧杀，就怕党的政策变了。”

“现在的许多新办法，是逼人造反。”

.....

这些意见都是很尖锐的，不能不引起她的注意。为了明瞭真相，她和罗助发同志商量，要下去调查情况。他们背着行李，徒步下到各个地区去。助发同志也是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们二人对农村很熟悉。有一次，他们深入到永定县合溪区等地区，这是乐春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群众一见乐春同志来了，感到是说话的机会到了，就纷纷前来找她，向她反映情况：

有人说：“过去我们分了田，贫雇农说话笃定，团结大家搞好生产，共同对敌。现在政策变了，人心不定，困难太多了。”

有人反映：“一个富农子弟参加革命暴动，现在县里工作得很好。他家分了坏田，他服从了。现在坏田变成好田，又要没收了，这怎么行？”

有人说：“医生，教师都不是贫苦农民，都不分田，怎么办？”

又有人说：“象这样下去，怎叫我们团结广大群众，打倒白鬼子？这是逼人上梁山啊！”

有个中农说：“这个政策会不会轮到我的头上，我的土地会不会没收？”

.....

乐春和助发同志耐心地听取群众意见，而且记录下来。群众看他们听得很认真，就对她说：“乐春同志，你是我们的部长，又是我们的知心人，请你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吧！”

这许多困难问题摆在乐春同志面前，她感到很棘手。晚上，她和助发同志商量，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以及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的问题。她知道这些群众是完全靠得住的，这些意见值得考虑。但是，目前的土地政策变了，土地部应该如何工作？怎样既听取了群众意见，有分析有区别地来处理问题，而又不做群众的尾巴呢？比如人家把坏田种成了好田，要是没收了，就不得人心，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参加革命，表现坚决的，要和那些一般的剥削分子区别开来；而现在混为一谈，怎样解决呢？于是乐春同志密切地依靠群众，同群众商量，正确地处理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她们把处理的情况，向省苏维埃政

府打了报告，省政府批准了她们的意见。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紧张地进行，敌人步步深入。乐春同志考虑到土地问题关系到整个战局的问题，需要很好的了解。于是和一部分同志到下面去调查。他们首先到了永定的虎岗区，这是个千把人口的大庄子，是原来执行错误政策最彻底的地方。后来敌人打进来了，在庄上按上了几个据点，我们多年来的工作就全部垮台了，而且垮得最彻底，连游击小组的会议也开不成，只有少数坚决分子在村里站不住脚跑了出来，大多数人被国民党利用来反对我们。

乐春等同志想进虎岗进行调查工作，由于没有可靠的群众，他们进不去，只好在虎岗的边界地区进行调查。她带着同志们又往前走，走到永定的溪南区、龙岩的白土区等地，这是暴动最早，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又因为这里战事频繁，敌人时来时去，“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在这里不好贯彻。因此，虽然敌人打了进来，在这儿按上几个据点，周围的地方仍是我们的，我们的工作仍然坚持下来，群众的游击战争开展很好，土地革命果实始终保持着。乐春同志在这里进行调查，她亲眼看见两种政策的贯彻，得到两种不同的效果。事实教育了她和其他干部，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论，这就显而易见了。

虽然乐春同志在土地部工作的二年半时间是在错误路线统治下渡过的，但她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是忠忠实实认真负责的，所以她用这样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也就是毛主席教导的精神，在一些地区里一桩又一桩的解决土地问题。一些同志批评她，说她是“温情主义”、“富农路线”，她没有因此悲观失望，也没有情绪波动；她感到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她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其后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执行三次“左”倾